

论波洛德的新目录学对莎士比亚研究的贡献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Pollard's New Bibliography to Shakespearean Study

何辉斌 (He Huibin)

内容摘要：波洛德把文本校勘与图书的物质形态研究结合起来，创造出影响深远的新目录学。他把新目录学的方法贯彻到莎士比亚 1623 年之前出版的四开本研究之中，从 19 本四开本中筛选出了 14 本善本和 5 本劣本，成为善本和劣本的定论。他还对第一对开本的底本、编辑和印刷进行考证，充分肯定了这个版本的权威地位。他断言这些四开本和第一对开本是莎剧的唯一具有“原始权威”的“档案”，之后的各种版本都以这些剧本为源头，其地位不可等同视之。他有力地反驳了以悉尼·李为代表的莎士比亚版本学的悲观主义，清除了良莠不分的悲观主义的恶劣影响。

关键词：波洛德；新目录学；莎士比亚

作者简介：何辉斌，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西比较文学和文学认知批评研究。

Title: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Pollard's New Bibliography to Shakespearean Study

Abstract: Pollard is the father of New Bibliography, who combines textual criticism with material bibliography. By applying the new method in the study of the 19 Shakespeare's quartos published before 1623, he selects 14 as good quartos and 5 as bad quartos, which has become a generally accepted conclusion. After studying the copy, editing and printing of the *First Folio*, he assures the edition is of authoritative position. These quartos and the *First Folio* are treated by Pollard as the only "documents" of "original authority" of Shakespeare's plays, and they are the only sources of the different later editions, which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equals. He also convincingly refutes the pessimism of Sydney Lee, and eliminates the bad influence of his undifferentiated pessimism.

Key words: Pollard; New Bibliography; Shakespeare

Author: He Huibin, is Professor at Institute of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nd is currently doing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Chinese and Western drama and cognitive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hehuibin@163.com).

波洛德 (Alfred William Pollard, 1859—1944) 是英国著名的目录学家, 新目录学的奠基人, 曾任目录学会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的名誉秘书, 出任过该学会会刊《图书馆》(*The Library*) 的主编。他将目录学与莎士比亚研究结合, 在莎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他的《莎士比亚的对开本和四开本: 莎士比亚戏剧的目录学研究, 1594-1685》(*Shakespeare Folios and Quartos: A Study in the Bibliography of Shakespeare's Plays, 1594-1685*) 是新目录学的开山之作。著名学者威尔逊在谈到波洛德的《莎士比亚的对开本和四开本》时曾说道: 这本书“一出版就被看作开创新纪元的著作……虽说有些结论不断被修改, 将总是被列为现代英语文本校勘的《伟大的复兴》”(Wilson 37)。目录学研究的最大优点在于客观性。目录学家迈凯洛曾说: “这些发现是真正的发现, 不单是观点类的东西, 而是经得起证明的, 没有任何后来调查可以动摇的东西, 这就是属于目录学研究的魅力所在”(McKerrow, *An Introduction* 5)。目录学的这种硬科学的特点, 可以为文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但遗憾的是, 国内对波洛德的莎士比亚目录学研究知之甚少。罗丽丽的《西方目录学史: 发展历程与基本文献》和王京山的《英美目录学的源流与发展》曾经从目录学的角度简单提到波洛德。顾绶昌的《莎士比亚的版本问题(续)》和史敬轩的《新目录学派志: 英国文学考据的兴起与没落》曾经从文学的角度也简短地触及。但目前还没有一篇专门的论文阐述波洛德的莎士比亚研究。

一、为新目录学奠定了基础

英国目录学协会会长科平杰 (Copinger) 早在 1892 年指出, 广义上看目录学有两个分支, “第一个分支指向书的内容, 可以叫做精神目录学 (Intellectual Bibliography); 第二个分支指向书的外在特征, 特定书的历史、版本等, 可以叫做物质目录学 (Material Bibliography)。第一种目录学的目的在于, 要么仅仅通过分类目录, 要么通过类似的目录或者以字母为序的目录, 给文人提供各个领域的重要书籍, 并对书的作者、特征和质量做出批评性的评价……第二种目录学……是关于书的知识, 它们的版本, 珍稀程度, 它们的真实价值和声誉, 以及在分类系统中它们分别应该占据的地位”(Copinger 31)。他还把物质目录学当作目录学本身 (Bibliography proper)。作为专业人士, 我们不能仅仅与精神目录学打交道, 只满足于查看一下与自己的研究和兴趣相关的图书。我们还应当看到目录编写背后的物质目录学, 掌握一定的对图书物质形态进行考证的本领。科平杰还指出, 这种以研究物质形态为主的目录学“正在快速成为准确的科学”(Copinger 33); “通过研究出版物并辨别‘书库’中的未辨别的著作, 目录学已经达到真正科学的模式”(Copinger 41)。这样的目录学, 也可以翻译成“图书学”。离开书的内容去研究物质形态, 不少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是将有趣的读书变成枯燥的学问, 但有人不这么认为。麦凯洛曾说: “每拿起一本新书, 我们就处于一个没有探索

过的尚无足迹的国度”，目录学因此是“历史研究诸领域中的最吸引人的一个分支”（McKerrow, “Notes” 221）。看来人的爱好非常多元化。

波洛德是图书考证的高手。他领衔主编的《大英博物馆现存 15 世纪印刷图书目录》（*Catalogue of Books Printed in the XVth Century Now in the British Museum*）的第一卷于 1908 年出版。坦瑟雷高度评价这本书，视之为“以往目录学的顶峰”（Tanselle 14）。但波洛德没有止步于传统的目录学。他接着在 1909 年出版了《莎士比亚的对开本和四开本》。坦瑟雷对此书也大加赞扬，他说：“这本研究莎士比亚的书标志着人们转向了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的戏剧，使之成为最有创新的目录学分析的领域，并且延续了六十年。这是被人们称作‘新目录学’的第一个里程碑——它之所以新，不仅仅是因为把焦点转向了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书，而且是因为践行者的主要目的都在于阐释文本的历史，文本史反过来又要求关注影响文本印刷的印刷车间”（Tanselle 15）。坦瑟雷还说：“某些早期的摇篮本专家，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不是没有注意到书的文本与物质结构之间的关系；但总体上看，这些学者聚焦于辨认各个印刷商的书，确认书的日期，他们对印刷商的习惯的分析没有大量地运用于探讨文本权威的问题……实际上，新目录学通常等同于这种意识，即文学研究不能忽略文本印刷过程的物质证据”（Tanselle 15）。波洛德是“新目录学”（New Bibliography）的奠基人，这个学派也常常被人们称为“波洛德学派”。从时间方面来说，之前的目录学重点在于考证 15 世纪之前的图书，而新目录学转向了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书，特别是戏剧作品。从方法论上看，传统目录学专家聚焦于图书物质形态的考证，而新目录学把物质形态研究与文本研究结合起来。

新目录学为学界带来了新局面，不少学者开始大显身手，其中最有名的是新目录学三剑客：波洛德，麦凯洛（Ronald B. McKerrow）和格雷格（Walter Wilson Greg）。格雷格对波洛德非常尊重，他说：“这个运动的真正开拓者是 A. W. 波洛德……谨慎而且保守，他从来没有视之为一个新的发现；他默默地向人强调，所有关乎文本的事情，都不能不关注保存了作者的文字的纸或者牛皮纸，或者说传递的物质过程”（Greg, “Bibliography” 28-29）。在格雷格看来，波洛德不但使文本研究与图书学结合起来，而且态度非常谦虚谨慎。格雷格还说：“1909 年见证了 A. W. 波洛德的装帧漂亮的《莎士比亚的对开本和四开本》的出版，这本书是目前为止这个主题的最系统和最有批评性的著作，标志着莎士比亚研究开启了新的时代”（Greg, “The ‘Hamlet’ Texts” 382）。可见波洛德是目录学上的里程碑，也是莎学史上的丰碑。

二、对四开本的善本和劣本做了权威的区分

在第一对开本出版之前，出版商曾经以四开本的形式单独发行了 17 个莎士比亚剧本，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哈姆莱特》分别出版了两个不

同的版本，总共为 19 本莎剧。但人们对于这些四开本的质量一直不太放心。赫明和康德尔在第一对开本的《致读者》中说道，我们“收集并出版了它们（莎剧）；由于你们曾经遭到不同的盗窃本和偷印本的虐待，那些版本被蓄意伤人的骗子的欺骗和偷窃所伤害并变得畸形，我们这次出版，目的在于暴露这些：正是这些，现在已经校订好了，四肢完好，出现在你们眼前；还有其他的戏剧，绝对是原始的诗体，正如他构思的一样。作为一个自然的巧妙的模仿者，他的描绘是那么文雅。他的心和手相一致：他表达思想轻松自如，我们在他的稿纸上几乎没有看到涂改”（Heminge, Condell 7）。这段话在莎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对开本之前的四开本质量低劣。波洛德的前辈悉尼·李坚持认为，“莎士比亚在世时出版的大部分四开本似乎都以一定程度上不完善的没有授权的剧院手抄本为底本，这些手抄本是出版商在某种程度上用不诚实的手段获得的（Lee xii）。”四开本的质量到底如何？波洛德给出了比较肯定的答案。

当时英国有一个“书商行会”（Stationers Company），正规出版物一般都在这里登记过。波洛德查看行会的登记情况后说：“现在如果我们看看那些直接或者间接作为第一对开本的源头的剧本，或者那些被独立的权威普遍看作拥有‘好’文本的并且和第一对开本属于同一家族的剧作……它们都有相同的特点，都在出版之前在书商行会登记过”（Pollard 64）。这些剧本为：《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理查二世》《理查三世》《亨利六世》（上篇），海斯—罗伯茨版的《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亨利四世》（下篇），费希尔版的《仲夏夜之梦》，林—罗伯茨版的《哈姆莱特》，派得·布尔版的版的《李尔王》《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奥赛罗》，总共有 12 部。这些正规登记过的剧本都一直被人们看作质量相当好的著作。

波洛德还发现，劣本四开本，虽说互相之间有着不小的差别，但也有共同点：“要么第一次出版之前根本没有在书商行会登记过，要么登记不符合常理，使我们怀疑有些问题”（Pollard 65）。这些剧本为：（1）丹特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巴士比与米林顿版的《亨利五世》，两者出版前都没有登记过；（2）第一四开本《哈姆莱特》和《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两个出版公司都在没有得到出版许可的情况下出版；（3）《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在登记的当天转让给了另外一个出版公司。这些程序可疑的剧本质量都明显较差。

波洛德还注意到，另有两个没有登记的剧本也被学者们看作善本。其中一部是伯比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波洛德说：“这个剧本没有在行会登记，这个剧本投入市场是用来取代‘劣本’文本的”（Pollard 65）。在波洛德看来，这个善本的出版，是为了消除劣本《罗密欧与朱丽叶》造成的不良影响。《爱的徒劳》也没有登记过。但这部作品却是一个出色的善本，后来被第一对开本采用。这本书的标题页上有“最新的威·莎士比亚修正增补本”（Newly corrected and augmented By W. Shakespeare）的字样。波洛德仔细研究各个四

开本，他发现善本《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标题页上有“最新的修正、增补、修改版”（Newly corrected, augmented, and amended），而且出版商也与《爱的徒劳》相同，都是卡斯伯特·伯比。此外，善本《哈姆莱特》的标题页上也有类似的说明：“根据真实完美的版本……印刷增补”（Newly imprinted and enlarged...according to the true and perfect Copie）。这一本《哈姆莱特》也是用来取代劣本的，但这个剧本正规地登记过。根据这些迹象，波洛德断定，《爱的徒劳》标题页说明“曾经有一个更早但更差的版本，……但这个版本已经完全消失”（Pollard 71）。在他看来，这个版本的《爱的徒劳》就像善本《哈姆莱特》和善本《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是用来替代之前的劣本的。这个推断虽然暂时还无法证实，但的确比较合乎逻辑。

波洛德进而讨论了当时剧本出版的总体环境。他曾指出，“皇家把出版权全部掌握在他们手里”（Pollard 64）。这就从法律上有了版权的基本保障。波洛德还说：“戏剧的印刷版权在莎士比亚时代显然有商业价值，这样的情况下，任何英国团体忍受自己有价值的东西被系统地剥夺而不奋力抵抗，那是不可思议的”（Pollard 64）。有了外在的法律，还有内在的利益驱动，盗版不可能轻易得逞。当时剧作家都把剧本卖给剧院，版权不在作者手里，而归剧院所有。所以对利益敏感的剧院，只要“戏剧还处于成功的顶点，演员们拒绝印刷本流行，然而只要当时流行样式一旦改变，戏剧失去了舞台价值，只要能够从出版商或者印刷商那里得到任何费用，就会成为一种额外的好处，我们无法想象这种利润的源泉会系统地遭到拒绝”（Pollard 64）。波洛德还从历史事实中找到了可靠的证据。英国在1593-4年由于瘟疫而关闭了剧院；1600年则弥漫着对清教徒干涉剧院的担心。在这两个时间段，“戏剧大量拿去出版，只能认为合法的拥有者提供了剧本”（Pollard 64）。平时由于剧院控制了剧本，所以出版的数量不多；这两个时段由于舞台上的利益减少了，剧院就把眼光投向了出版业。

除了书商行会的档案之外，还有很多细节可以用来判断一本书的好坏。波洛德在研究1597年丹特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时断定：“这是盗版本，全部或者部分是通过把记录人员派到剧场获得的，这一点几乎不需疑问”（Pollard 69）。他的理由是：（1）“虽然这个剧本记录的版本，也许与权威版本的底本并无区别，但省去了七百多行”；（2）“没有简短的舞台指令，代之以描述性的注释，可能属于记录员为了补充文本自然地草草写下的内容：‘乳媪进来，拧着她的手，绳梯放在她膝盖上——他试图刺杀自己，但乳媪夺走了匕首——他们之中只有乳媪向前走，把迷迭香撒在朱丽叶身上和正在收拢的幕之上——牧师弯腰看着血和凶器’”；（3）有证据证明这个剧本印刷很匆忙，因为印刷商同时使用了两幅不同的铅字：“开头16页（A—D印张）比剩下的24页（E—K印张）铅字字体更大”；（4）第3幕第4场之前没有分幕分场，之后开始分，但不是通过词语和数字分的，而是在新的一场开始

的地方插入印刷商的装饰性图标，前后不太一致；（5）印刷商丹特还“两次盗印过学校课本”，引来了巨大的麻烦（Pollard 69）。以前人们都觉得这本书的文本质量差。波洛德找又到了这么多的图书制作上的问题。这两种研究合在一起，充分证实了这是一个劣本。除了这个剧本之外，波氏还对其他剧本做了意义深远的考证。

在波洛德之前，人们对这些四开本的文本有过各种评价，大致结论与波洛德考证出来的结论也比较符合，但当时人们的评价比较主观化，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分歧。波洛德的书出版后，关于四开本的善本与劣本的争论才真正有了明确的答案。威尔森曾经指出：波洛德“善本四开本和劣本四开本”的区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Wilson 14）。可见波洛德的著作基本上一次性地解决了莎剧四开本的善本和劣本的问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三、全面考证了 1623 年的对开本

关于 1623 年的第一对开本的底本来自哪里一直是个谜。第一对开本标题页上写着醒目的一行字：“根据真正的原稿出版”（Pu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True Originall Copies）。而且赫明和康德尔还在《至读者》还声称，对开本“绝对是原始的诗体”。但后人马上发现，对开本采用了不少四开本的内容。波洛德曾指出：“毫无疑问，四开本的错误在对开本中重复，这就只能得出这样的解释，四开本（往往是最新的版本）曾经交给了对开本的排版工进行排版，所以任何总体上的对四开本的权威性的谴责都会严重地伤害对开本的权威（Pollard 1）。”第一对开本的出版者贬低四开本，本来是想抬高自身的价值，没想到后来却反过来成为自残的证据。所以关于第一对开本，学者们并不乐观，甚至有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逐步蔓延开。而且 1613 年莎士比亚的环球剧院发生了大火，许多剧本化为灰烬。这就使人们更加怀疑莎剧的可靠性。悉尼·李甚至说：“第一对开本的出版商在收集‘底本’时因此依靠的不是剧院。幸亏演员们习惯上，为了他们自己或者是有共鸣的朋友，偶然获取一部在某种程度上完好的成功戏剧的抄本。虽然有些剧本的私藏者把手稿弄丢了，但也有人仔细地保存下来，正是通过私藏者的细心呵护第一对开本的出版商才弥补了剧院档案的缺陷。通过这样的方式，手抄本，有时甚至是剧院的‘提词本’，从演员的储备中流出，传到出版商的手里。作为一条规则，私藏抄本，与官方抄本相比，更加粗心，普遍不完美；它们很少体现剧院最新的改编；它们省略掉舞台指令（Lee xix）。”悲观主义在李这里已经发展到了极致。

虽说 1613 年莎士比亚的环球剧院发生了大火，但莎剧的演出火灾后还在继续。悉尼·李曾断言：“起码有 18 部（如果包括《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则为 19 部）莎剧直到 1623 年还在剧院的演出剧目中（Lee xix）。”他提到的 19 部戏剧为：《无事生非》《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驯悍记》《暴风雨》《辛白林》《第十二夜》《冬天的故事》《亨利四世》（上下）《亨利五世》《理

查三世》《亨利八世》《奥赛罗》《裘力斯·凯撒》《麦克白》《哈姆莱特》《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但对开本只收了 36 个剧本，最后这部戏剧没有收，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里只需讨论是 18 部。波洛德把这些剧本与出版过的善本四开本重复的去掉之后说：“这些剧本的提词本因此肯定在演员的手中。这里面的 9 部（《暴风雨》《驯悍记》《第十二夜》《冬天的故事》《亨利八世》《裘力斯·凯撒》《麦克白》《奥赛罗》《辛白林》）加上 15 部莎士比亚生前出版的戏剧，还有两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五世》）迫切需要用好的版本代替劣本。这就是说总共 24 部戏剧没有必要寻找私藏抄本，作为一个事实，只有很少的已经印刷的版本被使用了（Pollard 119）。”在这里波洛德统计的时候犯了两个小错误。首先在善本四开本中已经包含了《奥赛罗》，不应该重复，而《亨利四世》（下）才是那部需要包括进去的戏剧。这 9 部加上《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五世》，总共为 11 部。这 11 部仍然在公演，质量应该没有大的问题，似乎剧院的提词本应当还在。但会不会有别的可能性呢？如提词本在大火中毁掉了，但剧院又从演员的私藏本中选取合适的剧本拿来演出。理论上，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之前出版的善本四开本是 14 部，不是 15 部。两者相加应当是 25 部。这就基本上能够说明，这 25 部莎剧不太可能出自私藏本。

波洛德对比之后发现，直至 1623 年还有 12 部既没有出版也没有上演的莎剧，它们是：《维洛那二绅士》《一报还一报》《错误的喜剧》《皆大欢喜》《终成眷属》《约翰王》，《亨利六世》（上中下）《科利奥兰纳斯》《雅典的泰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Pollard 120）。波洛德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些戏剧的具体情况，他说：“有些剧作，如最后一部，演员在 1613 年不太可能会舍得不要；至于其他戏剧，如《错误的喜剧》《终成眷属》《亨利六世》（上中下），如果假设这些戏剧在新鲜感退去之后观众还会竞相占有抄本，简直是大为不敬的。关于《亨利六世》（中下）没有必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可以绝对肯定地说用的就是提词本（Pollard 120）。”但在这里波洛德又犯了一个错误，《亨利六世》（上）已经包含在善本四开本之中，不应该列到这里。所以这一类的戏剧应该为 11 部。经过这样的分析，波洛德基本上否定了这 11 部戏剧来自私藏的假说。

波洛德对第一对开本的质量相当乐观。他说：“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第一对开本的 36 部戏剧中的 16 部先前已经印刷了四开本。准确地说一半完全没有被对开本的编辑采用，他们选择了使用手稿。其中 5 本四开本的使用带有增补、改正或者改变。在这可供使用的 16 本中只有 3 部四开本戏剧在后来的剧院使用中没有修订，起码是校正”（Pollard 121）。这 3 部原封不动地被采用的戏剧为 1598 的《爱的徒劳》，1600 的《威尼斯商人》，1609 重印的 1599 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5 部有增补、改正或者改变的本四开本为：1600 的《无事生非》，1619 重印的《仲夏夜之梦》，1615 重印的《理查二世》，

1613 重印的《亨利四世》，1611 重印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在被完全拒绝的 8 部戏剧中，2 部的确不好，有些还是相当好的 (Pollard 121)。这就说明编者当时找到了质量普遍高于四开本的底本。波洛德甚至断言：“就算 1613 年所有的环球剧院‘档案’都毁掉了，一些股东很可能手中持有一些‘原始版本 (Pollard 120)’。”虽然这句话尚无法证明，但也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

波洛德还对底本的来源做了这样的推测：“如果这些独立的手稿很难获得，还要付费，那么我们怎么样赞扬负责具体工作的编辑和批准这个项目的出版商的热情且超功利的态度都不为过，因为他们选择了更难更贵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手稿容易获得而且无需付费，显而易见，它们只能是在演员手中，‘私藏抄本’的理论变得更加多余” (Pollard 122)。对开本的编辑放弃现成的版本不用，只能说明他们心中有更高的标准。要么高价购得更好的版本，要么更好的版本就在他们自己手中。无论哪一种情况，质量肯定相当好。

虽说波洛德的论证颇有道理，但第一对开本的底本始终是个谜。波洛德也曾说：“我们没有任何权力肯定第一对开本的任何一行是根据莎士比亚的亲笔手稿排版的；但我们也没有任何权力完全排除使用手稿的可能性 (Pollard 120)。”波洛德的研究虽然提高了第一对开本的权威性，但是否真的出自莎士比亚本人的手稿还无法证明。

另外一方面，波洛德并不一味抬高对开本的价值。他曾指出，《无事生非》《爱的徒劳》《仲夏夜之梦》《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的四开本比对开本质量更好 (Pollard 128)。这就体现了一个学者以求真为首要目的的精神。

关于第一对开本的编辑，波洛德也做了很有意义的研究。他主要讨论了剧本的排序问题和剧本中的舞台指令。本文将就舞台指令展开探讨。

波洛德研究了出版作品和舞台上的戏剧指令的一些异同。他指出，（1）从舞台剧到书面剧本有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用帮助读者理解文本的指令代替提醒提词者和演员该做什么的备忘录；（2）如果看一看在第一对开本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剧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舞台指令，虽然一般没有现代版本那么多，它在形式上很少甚至没有古老戏剧术语 (Pollard 125)。另一方面，在地位次要一些的剧本中，可以找到不少带有明显的戏剧本质的舞台指令；在 1600 年版的四开本《无事生非》的第四幕第二场中，剧本用演员的名字坎普 (Kemp) 和考利 (Cowley) 替代的人物名字道格培里 (Dogberry) 和弗吉斯 (Verges)；四开本的源自剧场的痕迹在对开本中也复制过去了，甚至还加上了一些，如《无事生非》第二幕第三场的歌唱场面出现了杰克·威尔逊 (Jack Wilson)，而不是将上台的“乐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似乎不仅仅是四开本以提词本为底本，而且这个四开本还在印刷对开本的时候还发挥了作用，编辑没有删掉原本仅仅为剧场使用的“指令” (Pollard 125-7)。波洛德的推测有一定的道理，但格雷格则认为，出现了演员的名字未必就是提词本 (Greg, *The Shakespeare First Folio* 95)。当时莎士比亚是为具体的剧院创作的，也许

也会直接把演员的名字写入剧本。

关于第一对开本的印刷，波洛德讨论了不少有意思的细节，其中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印刷错误。在第一对开本的印刷中最严重的印刷事故与《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有关。第一对开本把喜剧放在第一部分，历史剧放在第二部分，重新标页码，悲剧属于第三部分，也是重新标页码。在目录页上可以看到，《亨利八世》是最后的历史剧，《科利奥兰纳斯》是第一部悲剧。翻开这本书，就会发现这部历史剧末尾页码为 232，《科利奥兰纳斯》第一页的页码为 1。但两者之间插入了一部戏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这部戏剧的前两页页码为 79 和 80，后面干脆全部没有页码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是《雅典泰门》。有意思的是，《雅典泰门》在 99 页就结束了，紧跟其后的《裘力斯·凯撒》的第一页却为 109 页，中间有这么多的空缺。波洛德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为：（1）《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原先的首页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后一页的背面，在已故的伯德特·库茨男爵夫人收藏的第一对开本中，这一页的内容仍然存在，没有被用来替代的内容取代。（2）这部戏剧被整个连根拔起，不仅仅是想换个地方；显然是要删除，因为直到印刷目录时这个剧名还未列上去；（3）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是，只有版权的困难，才可能引起这么严肃的变化；（4）《雅典的泰门》是用来填补《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也造成了页码上的问题（Pollard 136-7）。整个过程就像福尔摩斯破案，体现了作者的超强的推理能力。

悉尼·李曾经断言：“就算第一对开本的最终目标是出版莎士比亚的所有戏剧，但无法回避原始手稿缺失的问题，只能以剧院完成的手稿或者官方的‘提词本’为依据进行印刷，他们的目的也只能由于没有意料到的偶然事故注定了失败”（Lee xix）。在李先生看来，第一对开本的底本不可能是莎士比亚的原始手稿，剧院的官方脚本的可能性也很小，基本上属于私藏本。但波洛德认为，这部对开本基本上不可能是私藏本，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剧院脚本，有些甚至来自莎士比亚自己的手稿。

波洛德在充分考证了这些莎剧之后说：“在 1623 年的对开本中和之前的四开本中，我们在其中找到了堪称莎士比亚文本信息的原始权威的唯一档案。之后的四开本意义甚微，甚至全无，唯一的价值在于显示了某些戏剧对读者引起的兴趣”（Pollard 153）。他还说：“三个对开本。它们把第一对开本的拼写不断进行现代化，把不同的微小的语法或者句法的不规则性抹平……没有一点理由相信，采用了任何原始资料来提高文本。如果真的发现了这样的资源，毫无疑问他们会在标题页中夸耀一番，并且在前言中明确地告诉读者，使读者终于可以确信，作者的真实文本出现在眼前了”（Pollard 153）。这就明确地把莎剧的各种版本的好劣区别开了，在莎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迈凯洛曾经这样描述莎学史上的版本问题：“形成好的莎士比亚的文本的方式为，将尽量多的早期版本进行比较，从中获取最好的阅读。如何选择‘最好的’，

虽是一个重要问题，往往无人讨论。对于供他们选择的材料不多加思索，是在显示，如果打算（他们显然是这样做的）重建接近莎士比亚写的文本，那么这种方法是荒谬的” (McKerrow, *The Treatment of Shakespeare's Text* 20)。之前关于哪些是最好的版本，学者们都不愿意直接表态，而是往往尽量多地找到不同版本的莎剧，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求来进行阐释。相比之下波洛德是更有责任心和能力的学者，他直面难题，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四、全面地反驳了悉尼·李的悲观主义观点

关于莎剧的版本问题一直有一种悲观的倾向。在 1902 年影印版的第一对开本中悉尼·李的《导论》全面反映了这种悲观主义情绪。波洛德对李的观点一一加以反驳，他说：“他把自己置于目录学悲观主义者之首，（我希望）以健康而果敢的乐观主义者的名义，我发现自己几乎在每一点上都与他对立 (Pollard v)。”本文在论述四开本和对开本时，已经提及波洛德对悲观主义的一些反驳，下文还将讨论四方面的问题。

首先李先生认为，文艺复兴时代剧作家没有保留剧本的习惯。他说：“那时为自己出版手稿，或者鼓励别人出版手稿，或者保存手稿，与剧作家的习惯相悖” (Lee xi)。波洛德不这么认为，他指出，“除了创造者自豪感这个问题之外，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指的是剧本）有一天可能‘派上用场’这个观点对于莎士比亚本人的精明的本性而言肯定出现过” (Pollard 120)。一个正常的作家不可能不在乎自己的著作。

其次李先生断定剧院对剧本也不在意。他说：“一旦送到剧院之后，没有人会真正尊重剧作家的原始手稿。经理可以自由地删去一场又一场、一段又一段的内容，因为他是所有者，为了舞台的目的，他还做了其他改变。最后经过修改的手稿由剧场的书记人员抄写，并成为官方的‘提词本’，原稿，没有了用处，被弃置一边并且毁掉” (Lee xviii)。他还宣称，“老剧本的‘提词本’一旦对公众失去了吸引力就马上被抛弃” (Lee xix)。剧场根据演出的需要做适当的删改是可能的，但大量而随意地删改似乎不可能。难道这些工作人员水平比莎士比亚高吗？无论从艺术情感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商业意识来说，剧场都不会轻易丢弃使用过的剧本，而是爱护有加，甚至还会设法充分挖掘出版的经济价值。这个问题在讨论四开本的时候已经有所触及。

第三，李认为出版商获得的底本质量很差。他说：“作者的手稿和权威的抄本都在剧院经理手里，出版商无法获得。他经常出版粗糙的戏剧版本，这种版本往往通过雇佣勤奋的看戏者在表演的过程中从演员的嘴中获取，并且通过速记或者普通书写记下来” (Lee xii)。他还说：“出版商经常买通一个书记员或者演员，以便获得粗糙的剧本，这种剧本往往是为了剧院的次要目的匆匆抄录的” (Lee xii)。波洛德在研究四开本时指出，类似的粗制滥造的剧本的确有，但那是少数。至于对开本，其版本都相当好。

第四,李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出版界的法律环境比较不乐观。他说:“在没有法律禁止的情况下,他们自由地享有出版任何手稿的权力,不管通过什么渠道弄到手,只要他们从书商行会购买了许可证”(Lee xi)。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四开本的时候已经谈到,当时的出版界当然有法律保障。波洛德反驳道:“(a)许可证并非总能获得,不管是购买还是其他途径,(b)他自己列出来作为不好的盗版剧本从来就没有注册过”(Pollard 3)。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对当时的出版管理了解并不深入。波洛德还曾说道:“只要我们能够证明这一点就足够了:如果他们不是诚实的商人,他们起码是谨慎小心的商人,对与官方冲突有一种有益的惧怕,这种惧怕给作者和戏剧公司以更多真实的保护,比那些对局势的严格的逻辑演绎能够暗含的保护多得多(Pollard 3)。可见当时的出版界还是比较有序的,并非盗版猖狂的时代。

总体上看,波洛德对莎剧的版本颇为乐观,他说:“盗版似乎是偶然的意外,剧本的确不便地处于这样的时代,但演员,特别是莎士比亚剧团的演员,与之做了富有成效的斗争;盗版不多,也可以与忠实的版本清楚地辨认出来,它们对我们今天的版本没有留下痕迹”(Pollard v)。虽说波洛德的观点也有可疑之处,但与李的悲观主义相比,他的乐观主义更有学理基础。

结语

波洛德在目录学史上和莎学史上都有一席之地。从目录学的角度来说,他把文本校勘与图书的物质形态研究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目录学,在二十世纪具有重大的影响,时间长达60多年。他把新目录学的方法贯彻到莎士比亚的1623年之前出版的四开本研究,从19本四开本中筛选出14本善本和5本劣本,充分肯定了14个善本的价值。他还对第一对开本的底本、编辑和印刷进行考证,充分肯定了这个版本的权威地位。他断言这些四开本和第一对开本是莎剧的唯一具有“原始权威”的“档案”,之后的各种版本都以这些剧本为源头,其地位不可等同视之。他对以悉尼·李为代表的关于莎士比亚版本学的悲观主义进行有力的批评,清除了良莠不分的悲观主义的恶劣影响。威尔逊曾指出,波洛德目录学研究的两个重要优点为:“不断上升的‘客观’价值和判断的更加容易”(Leachman 70)。这两个优点使他在很多问题上面超越了前辈,但也使他的学问容易被后人超越。

麦凯洛曾经指出,就是“在其他方面学养很好的学者”常常显示出“对图书生产的机械方面的最基本事实都一无所知,真是让人费解”(McKerrow, “Notes” 217)。这种情况在西方很常见,在国内外国文学界更是比比皆是。国内虽然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莎学家,但在物质目录学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建树。没有物质目录学的坚实基础,学术研究往往就会显得不够扎实。在大家积极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今天,我们应当抓紧补上这一课。

Works Cited

- Copinger, Walter Arthur. "Inaugural Address." *Transaction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1 (1892-93): 29-59.
- Greg, Walter Wilson. "The 'Hamlet' Texts and Recent Work in Shakespearian Bibliography."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14, No. 4 (Oct. 1919): 380-385.
- . "Bibliography: A Retrospect."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1892-1942: Studies in Retrospect*. Ed. Frank Francis. London: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1945. 23-31.
- . *The Shakespeare First Folio: Its Bibliographical and Textual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5.
- Heminge, Iohn and Henry Condell. "To the Great Variety of Readers." *Shakespeares Comedies, Histories & Tragedies* (The Folio of 1623), *A Reproduction in Facsimi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2.
- Leachman, Roger. "Alfred William Pollard: His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Alfred William Pollard: A Selection of His Essays*. Ed. Fred W. Roper. Metuchen, N. J.: Scarecrow Press, 1976. 58-77.
- Lee, Sydney. "Introduction." *Shakespeare's Comedies, Histories & Tragedies* (The Folio of 1623), *A Reproduction in Facsimi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2. xi-xxxv.
- McKerrow, Ronald B. "Notes on Bibliographical Evidence for Literary Students and Editors of English Wor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ransaction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12 (1911-13): 211-318.
- .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for Literary Stude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7.
- . *The Treatment of Shakespeare's Text by his Earlier Editors, 1709-1768*. London: Humphrey Milford Amen House, E. C., 1933.
- Pollard, Alfred W. *Shakespeare Folios and Quartos: A Study in the Bibliography of Shakespeare's Plays, 1594-1685*. London: Methuen and company, 1909.
- Tanselle, George Thomas. *Bibliographical Analysis: A Histor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9.
- Wilson, John Dover. "Introduction: Alfred William Pollard 1859-1944." *Alfred William Pollard: A Selection of His Essays*. Ed. Fred W. Roper. Metuchen, N. J.: Scarecrow Press, 1976. 1-57.

责任编辑：郑红霞